

從「事件史」到「事件路徑史」的探索

——評馮志陽《庚子救援研究》

● 馬金生

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整理，作者全面詳細地揭示了一個學界少有人知的歷史事件，那就是庚子國變期間，身處上海的東南紳商曾經掀起了一場針對京津難官難民的重大救援行動。



馮志陽：《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如果提起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個庚子年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甚麼重大事件，相信不少國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到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在這千年未有的歷史變局中，慈禧太后和

光緒皇帝倉皇「西狩」，扔下了一副爛攤子等着臣下收拾和打理。除此之外，人們很少會去想：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在這座帝國都城中發生了甚麼樣的歷史故事？群龍無首的官員如何面對這場國難？他們如何去求取生存？內心深處又有着怎樣的所思所想？對於陷入國難中的京城官員和百姓，其他省份的官紳士商又有哪些認識和作為？如此等等，任何一個問題都使人們既覺得有趣，同時又感到茫然沒有頭緒。

201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馮志陽博士出版了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史學著作《庚子救援研究》（引用只註頁碼）。在這部書稿中，作者試圖回答上述問題。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整理，作者全面詳細地揭示了一個學界少有人知的歷史事件，那就是庚子國變期間，身處上海的東南紳商曾經掀起了一場針對京津難官難民的重大救援行動。在這場持續了近半年的救援行動中，東南紳商

不辭辛勞籌措經費、運輸糧食，甚至不惜以身犯險，親自從上海奔赴京津實施救援。為了呈現相關歷史事實，作者於各種史料中沉潛往復、考訂求索，歷時達五年之久。最後完成的書稿洋洋灑灑四十餘萬言，是一部相當扎實且厚重的學術著作，顯然值得認真研讀和推介。

一 庚子救援研究緣何長期未受重視？

義和團運動史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史學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史」範疇，一度是史學研究的熱門領域。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內相關研究已非常成熟，學術成果頗為宏富。有學者統計，從1950到2012年，國內關於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論文和文章應不少於2,300篇^①。相關研究論著、論文集和小冊子等，恐怕也在百部以上。對於一名博士生而言，想從義和團運動史中尋找論文選題，顯然並非易事。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馮志陽在這塊開墾殆盡的土地中竟然發現了一塊「處女地」。歷經五年辛勤耕耘後，最終收穫了令人眼前一亮的研究果實。捧讀本書之際，最讓筆者感興趣的是，對於庚子救援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緣何在學界長期受到忽視或者冷遇？易言之，作者為何能夠在現有研究的阡陌縱橫中獨闢蹊徑，發現了這一「礦藏」？筆者認為，相關原因或可從如下三個方面加以尋找：

首先，與晚近以來史學研究理念的轉變有關。自二十世紀末特別

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吸引了諸多青年學子加盟其中。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摒棄了原有的宏大歷史敘事模式，有關研究「從圍繞人的環境轉向關注環境中的人」，「關注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人」^②。在相關史學理念的轉變下，研究者開始從底層視角對歷史進行重新審視，從而使以往為學界所忽視的諸多問題受到重視。

儘管馮志陽在書中並未明言自己的史學寫作受到新文化史的影響，但其所秉持的學術理念，卻有着非常清晰的體現。作者在第一章指出，以往關於庚子國變的研究，往往關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過程、性質和意義，以及義和團與清政府、外國侵略者之間的關係等宏大議題，而「對於這場運動中具體歷史人物的命運較少關注」。即使一些研究有所注意，相關成果也主要聚焦在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榮祿、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重要歷史人物身上，重點討論他們在這場鉅變中的歷史作用和影響，但對於這些人物本身的命運並不關心，對他們在庚子國變中「或彷徨、或憤怒、或掙扎、或得意、或憂懼、或無奈」的心境更是無從着墨（頁23）。作者更進一步指出，本章主要關注那些「被動承受這個歷史過程的普通京官」，關注他們「坐困愁城的日常生活狀態，包括他們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頁24-25）。不難看出，作者針對既往研究中的不足，將關注重心放到了少為人關注的京官群體身上，將他們作為實實在在的「人」加以考察，關注他

作者針對既往庚子國變研究中的不足，將關注重心放到了少為人關注的京官群體身上，將他們作為實實在在的「人」加以考察，關注他們被拖進歷史泥淖中的困頓和掙扎等歷史諸面相。相關理念非常清晰地詮釋着新文化史的潛在影響和印記。